

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七十年发展成就略说

霍巍 陈默 董华锋 李帅 王果 徐法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5)

摘要: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且不断前进的历程,按照学科发展的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49—1976年,第二个时期为1977—2012年,第三个时期为2013年以来的新时代。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四川省的历史科学在学位授权点、科研机构、专业学术团体、学术刊物等学科建设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七十年来,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建设下,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历史学方面,上百本重要论著是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考古学方面,在出版大量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论著的同时,学术成果涉及的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国际化程度不断加强。

关键词:四川哲学社会科学;历史学;考古学;学科建设;学术成果;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05(2019)05-0058-15

doi:10.19642/j.issn.1672-8505.2019.05.007

A Study of Historiography and Archaeology of Sichuan Since 1949

HUO Wei CHEN Mo DONG Hua-feng LI Shuai WANG Guo XU Fa-y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ichuan's historiography and archaeology has made a tortuous progres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these two disciplines can be viewed as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is from 1949 to 1976, the second one is from 1977 to 2012, and the third one is the new era since 2013. In the 70 years, Sichuan's historical disciplines have obtain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number of degree authorization points, the researching institutes, academic societies, and relevant professional journals. In the meantime, historiography and archaeology of Sichuan have acquired considerable improvements with the contribution of numerous scholars. As to historical research, more than 100 significant books have earned their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In the realm of archaeology, besides a great many excavation reports and researching works, transnational academic cooperation and broadened scope of studying fields prove to be the features of recent years.

Key word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Sichuan; historiography; archaeolog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作为四川省长期以来的传统优势学科,历史学(含考古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前人曾对此做过一些梳理,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参考^①。本文拟在全面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努

力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七十年发展取得的成就做一简要梳理和分析。由于牵涉面极广,篇幅有限,很多重要的学者或论著恕无法一一述及,不当之处,敬希谅解。

收稿日期:2019-07-04

基金项目:2019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学科70年发展研究”(SC19ZD15)。

第一作者:霍巍(1957—),男,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考古学、文物学、博物馆学。

引用格式:霍巍,陈默,董华锋,等.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七十年发展成就略说[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8(5):58-72.

一、学科发展脉络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且不断前进的历程,在学科建设、学术成果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按照学科发展的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49—1976年;第二个时期为1977—2012年;第三个时期为2013年以来的新时代。

第一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学(含考古学)逐步由民国“新史学”的脉络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新轨道转换。以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等为首的广大史学工作者在保存和沿续四川史学既有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教学和科研,遵循“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的原则,取得了一系列瞩目成就。不少高校均改设、新设了历史学专业,少数高校新设了考古学专业,系统地进行史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四川的历史学家积极参与了全国性的关于中国奴隶制、封建制分期等问题的讨论,撰写了大量论文。此外,土地制度、汉民族形成、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巴蜀文化等问题也是史学工作者讨论的热点。这一时段四川史学(含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方面拥有较大的优势,另外魏晋南北朝史和宋史也相对突出。其次,在中国近代史方面特别是近代四川方面,也积累了雄厚的基础。民族史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新亮点,伴随着1956—1964年的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与民族语言大调查,西南民族研究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同时,考古学通过一系列的考古活动,取得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成果,特别是新旧石器时代考古、巴蜀考古、西南民族考古、历史时期考古等方面在四川乃至全国考古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时段的四川史学以川大史学为代表,体现出重视文献、语言的特点,学术水平比肩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等国内顶级机构。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川省的历史学(含考古学)在曲折中不断探索。老一辈史学家以及广大的史学工作者尽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无法从事正常的学术活动,但仍在逆境中坚守自己的历史职责,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中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四川

省历史学(含考古学)总体处于停滞状态。

第二个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往日的某些禁区和空白得到开放和填补。老一辈学者逐渐退出了科研教学第一线,然而薪火相传,新一代的学者继承了前辈重视史料、重视多重证据相互印证的治史风格,积极吸收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披荆斩棘,勇于创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大量传入,成为历史学家广泛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帮助研究者找到了新的学术热点。无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各个专门史的研究,还是考古学,既频出成果,又涌现人才。新的学科点在各个高校中先后设立,一定数量的硕士、博士陆续入学,为人才梯队的建设奠定了基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在省内各地召开,学术交流活动较为活跃,国内外卓有成就的权威学者纷纷入川开展讲座并访问讲学,学术风气十分浓厚。研究方面,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元史、明清史、巴蜀古史研究均得到相当的推进;保路运动史、四川军阀史、革命史、宗教考古研究等各方面均有历史性的突破;希腊罗马史、文艺复兴史、西亚史、西方史学史、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也出现了有分量的作品;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拓展了藏族史、羌族史、彝族史等许多新的研究方向;三星堆遗址出土等重要考古发现推动了巴蜀考古、西南考古等领域取得巨大进步,并拓展出西藏考古等新的领域。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的最初十年,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在既有基础上继续奋进,成果斐然。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得以成长,接过了老辈学人传下的衣钵。过去研究的高峰得以保持,新的学术增长点不断出现,四川省历史学、考古学在国内外开始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研究者在总结20世纪史学宝贵积累的基础上,同时与西方历史学界的流行思潮广泛接触,逐渐摸索出一条新的治学道路。一方面,这一时段的历史学较过去更为强调原始资料的重要性,在史料的尽量扩充方面做出了较大的努力;另一方面,学者们重视学术对手方的进展,不断与西方同行进行着接触和对话,并借助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既有研究。学术的快速发展体现

在多个方面。相当数量足够分量的学科点、基地、中心得以构建,不少重要的历史、考古问题得到特定机构的专门研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高水平人才培养在质量和数量上均得到突破,史学工作者的专业素养较以往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在中国古代史研究这个传统优势领域中,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和宋辽金元史维持了过去较高的水平,秦汉史、隋唐史、明清史、历史地理也开始出现高质量的论著。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异军突起,城市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社会史等新研究方向的开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内涵,在国内享有较高的声誉。文艺复兴史、美国史是世界史研究的新增长点。民族史研究迎来了新的高潮,新史料的发现和整理,催生了不少新的题目和研究。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晚期巴蜀墓葬、佛教道教遗存的系统调查及盆地周缘山地区域的重要考古发现推动巴蜀考古、西南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宗教考古进入了繁盛期;西藏考古持续发展,首创道教考古;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科技考古等领域也逐步兴盛。改革开放之后,四川省历史学始终牢牢处于西部顶尖、全国一流的水平,在国内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在国际上也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

第三个时期,进入新时代以后,四川省史学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锐意进取,在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含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四川的历史学家们既强调实证又承认理论的重要性,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方面具有高度的学术自觉,在面对“史学碎片化”的问题上也提出过独到的看法。在“守先待后”的进程中,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学科建设方面整合优势领域,在巴蜀文明、西南民族、区域历史、基层社会、文化遗产等方面建立了一系列科研基地,系统地打造历史学(含考古学)的“四川学派”。同时,新的学科点继续扩充,广泛布点。人才培养侧重于质量优先的理路,精心培育了一批在国内外均有影响的专业人才。学术交流相当频繁,迎来了新一轮高峰,极具重量的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次第在川内召开,国内外学术权威纷至沓来谈经论道,国际合作向着更高的层次迈进。先秦史、魏晋南

北朝史、宋辽金元史的研究开始转向,新的题目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延续了过去的强势地位,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学术史、经济史、法制史、共和国史多点开花,一些研究在全国范围内保持了领先地位。世界上古史、文艺复兴史和美国史研究进一步发展,并向更为艰深的领域迈进。民族史研究与边疆学、中外交通史等学科有机融合,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特点。考古学在巴蜀考古、西南考古、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墓葬考古、宗教考古、科技考古、西藏考古、境外考古等方面持续开展田野工作并取得重要收获,同时在四川古代文明起源、巴蜀文化的考古学谱系、西南山地的考古学文化、四川古代文明的地域性特征、四川盆地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融合进程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总而言之,新时代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经历了一个空前快速的发展期,呈现出百花齐放、高度繁荣的景象。

二、学科建设历程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四川省的历史科学在学位授权点、科研机构、专业学术团体、学术刊物等学科建设诸多方面筚路蓝缕,不断在探索中前进,逐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 学位授权点的建设

上个世纪50年代多所高校开始设立历史学本科,招收本科生。1950年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建立西南师范学院,设史地系,1952年史地系分为历史系和地理系。1951年西南民族学院政史系成立,1956年西南民族学院历史学专业创立。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华西协和大学文理哲学院与博物馆并入四川大学;同年,原私立川北大学哲史系和私立川北文学院历史系合并为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开设本科、专科专业,每年招生100人,本专科各占一半。1954年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科创立,于暑期开设一年制师资训练班(即短训班)文史专业。1956年,按国家高教部决定,四川师范学院迁往成都,历史系本科随校迁至成都,专科留下成立南充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科。后因院系调整,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分之二的师生又于1964年回迁南充,剩余教师则划入该校政教系成立历史教研室。进入60年代,四川省历史科学又迎来了考

古学的诞生。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正式设立考古专门化,成为全国第三所设置考古专业的高校,也是四川省考古学高等教育的开端。1961年,冯汉骥先生在四川大学招收了1名考古学(副博士)研究生,标志着四川省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开始。后因“文革”影响,四川大学考古专门化一度停止招生,1972年教育部批准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恢复考古学专业(将考古专门化正式更名为考古学专业),次年开始招生。

改革开放前后,各高校历史学系逐渐恢复招生,多所高校新设置了历史学本、专科专业,也有高校开始获得硕士、博士授权点。1977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恢复招收本科生,77级共招收学生80人。同年历史学(中国古代史)与古文字学获得硕士学位授权点,并于1978年招收硕士研究生9人。同年,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招收了四年制本科学生20人,这是普通高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恢复后招收的首届本科生;而后又于1982年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3人。1977年西南民族学院政史系历史专业也开始招收本科生,77级共招收学生58人,1985年改组为历史系。1977年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史地系开始招收政史专业本科生,学制四年,77级共招收学生70人;1979年重庆师范学院史地系改组,原政史专业独立成政史系,1982年政史系更名为历史系。1978年南充师范学院政史系改组,历史系成立;同年四川省教育学院历史科创立。1978年四川师范学院政教系历史专业恢复招生,1981年正式恢复历史系,1985年更名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1979年绵阳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科开始招生。

198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四川大学历史系成为中国古代史和全国首批考古学博士学位授权点,该年招收中国古代史博士一名。同年,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获得历史学(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授权。此后省内各高校历史学、考古学专业本专科和硕士博士学科点陆续增设,并开始建立博士后流动工作站。1984年,内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绵阳师范专科学校和阿坝师范专科学校均成立了政史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获得专门史硕士学位授予权。1985年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86年康定民族师范专科学校

政史系成立,招收普专生49人,该届学生三年的专业课程均由四川大学历史系教师教授。198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新增博物馆学专业,同年9月博物馆学专业首届本科生20人入学。1991年,重庆师范学院设立考古学专业。1996年,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西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均获得专门史硕士学位授予权,同年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被评为四川省重点学科。1997年四川师范学院历史教育专业改扩为历史学专业。199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更名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同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之后于2001年设立考古学系,下设考古学、博物馆学两个专业。2001年内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成立,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获得世界史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02年,四川大学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入选“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同年专门史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03年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重组建立;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组建立;内江师范学院政治经济系、历史系、马列德育教学部合并成立政法与历史系。同年,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得历史文献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授予权;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申报并共建民族学博士点。2004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专门史硕士点获准重建。2005年西南民族大学获得考古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6年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础教育系拆分与政史系合并为人文社会科学系。2007年,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献学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同年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旅游学院更名为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0年,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获得民族学一级博士学位授予权,同时获批设立民族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同年西华师范大学获得考古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11年考古学和世界史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新的一级学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得中国史、考古学、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并于同年开始招收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次年又设置了考古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新时代四川省历史学科建设继续蓬勃发展。2015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获准设立全国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同年四川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也获准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2016年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和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合并组建文学与历史学院。2017年,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入选四川大学“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同年阿坝师范学院原思政课教研部与人文社会科学系合并组建马克思主义学院,设历史教育本科专业。2018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一级学科申报成功,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2019年成都体育学院历史文化系成立,将于9月开始招收本科生。

(二) 科研机构的建设

伴随着学科点的增加,科研机构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变化。1951年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成立。1959年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民族研究所成立,1964年改组为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系四川省委民族工作委员会的科研机构,该所建立以来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民族学界获得了较高的地位,是全省现有民族科研机构中,在全国该领域影响最大、成果最丰、地位最高的学术单位。1962年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室成立。1978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地方史研究室成立,1979年历史研究室、地方史研究室合并为历史研究所,下设中国古代史研究室、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等机构。1978年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1979年,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地方史研究室成立。1980年,四川大学历史研究所成立。1983年,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同年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成立。1985年西南师范大学西亚研究所成立;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地方史教研室、思想文化史教研室设立;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室改组为体育史研究所。1990年,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与三国史研究中心成立。1995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经教育部批准为国家历史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6年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成立。2000年,四川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国藏学研究所成立,后者经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百所重点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重点基地”。2001年,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经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下设巴蜀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等若干研究所。

2003年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成立。2004年,四川大学建立教育部“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南亚与中国藏区”平台;同年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社会研究所成立。2006年,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成立;2010年,四川大学中国西南文献研究中心成立;2011年国家文物局与四川大学共建“新世纪人才培养基地”。2012年,四川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通过教育部的检查验收,正式成为全国仅有的4个国家级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之一。

进入新时代以后,四川历史科学的研究中心更是大量增加,并出现与国内外高校开展合作的趋势。2013年,由西北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四所高校考古学专业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建“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2016年,四川大学西部中国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作研究中心成立。2017年首批10个四川历史名人文化研究中心在四川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单位设立。2018年,四川省秦巴历史文化研究院成立;同年四川省二〇一一协同创新中心“藏羌彝走廊民族问题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成立,该中心由西南民族大学牵头,联合四川大学、西藏社科院等单位组成相对独立的非法人实体的协同创新中心;另外该年度还有四川大学与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合作共建的“中美亚洲山地考古联合实验室”成立。2019年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成立。

(三) 考古文博机构的建设

考古文博机构的建设是四川省历史科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七十年的发展,四川地区各级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所逐步建立起来。1949年,原四川省立博物馆更名为川西人民博物馆。1951年,川西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1952年,西南博物院在重庆成立,徐中舒任院长,冯汉骥任副院长,邓少琴任业务秘书,此为重庆博物馆前身。同年,“川西人民博物馆”更名为“四川省博物馆”;原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划归四川大学并更名为“四川大学历

史博物馆”;西南民族学院民族博物馆成立。1953年,因川西行署与其它三个行署合并为四川省,川西文物管理委员会亦更名为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此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1958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四川省博物馆合署办公;同年,成都市人民政府筹备组建成都市地志博物馆,此为成都市博物馆前身。1959年,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在西秦会馆内成立。1973年,武侯祠文物保管所成立;同年,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立,此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的考古文博机构,特别是博物馆迎来了建设高潮。1981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四川省博物馆分离。1984年,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并入成都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和四川宋瓷博物馆成立;原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正式更名为四川大学博物馆。1985年,杜甫草堂博物馆成立。1990年,成都王建墓博物馆成立。1992年,成都市文物管理处从成都博物馆分离,成立成都文物考古工作队。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四川省陆续新建了一批遗址类博物馆。1996年,明蜀王陵博物馆成立并对外开放。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建成开放。1998年,成都王建墓博物馆更名为成都永陵博物馆。2003年,成都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船棺遗址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古蜀遗址博物馆、成都隋唐窑址博物馆整合组建为成都博物院。2004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更名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07年,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2009年,四川博物院新馆落成开放。2011年,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建成开馆。2013年,成都水井坊博物馆成立并对外开放。2015年,成都博物院分设为成都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2016年,成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并开放。

(四) 专业学术团体的建设

专业学术团体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与科研机构相生相成,成为学者们联系、交流的重要平台。1979年,四川省历史学会、四川省民族研究学会、重庆市历史学会、四川省巴蜀史研究会相继成立,其中徐中舒先生担任会长的四川省历史学会起到了凝聚人心、团结众人的重要作用。1981年成都市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1984年成都市历史学会成立;1985

年四川省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1989年四川省华侨历史学会成立;1993年重庆巴文化研究会成立;1995年四川省藏学研究会成立;2009年四川省博物馆学会成立;2014年四川省秦巴文化研究会成立;2017年四川省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

(五) 学术刊物的建设

学术刊物的编辑出版,也始于改革开放前后,专业期刊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发表新见的舞台。1980年四川省历史学会与四川省民族研究学会主办的《历史知识》创刊。1981年西南师范学院主办的《西亚研究》创刊。1983年成都文物管理委员会创办《成都文物》。1984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办的《四川文物》创刊。1987年由童恩正先生创办并任主编的《南方民族考古》创刊。1992年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办的《宋代文化研究》创刊。2001年,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巴蜀文化研究集刊》创刊;同年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的《成都考古发现》创刊。2004年,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主办的《藏学学刊》创刊,该刊于2014年入选CSSCI来源期刊。2006年,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全英文学术季刊《中国历史学前沿》创刊。2010年,《南方民族考古》复刊,目前已出版至第十六辑。

(六) 科研项目的申报

得益于各个学术平台持续不断的建设与发展,四川省历史科学在学科项目的申报上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以国家社科基金为例,截至2019年6月,全省历史学、考古学共有12项重大项目立项,分别是2009年舒大刚任首席专家兼总编纂的《巴蜀全书》工程;2010年石硕任首席专家的“大型藏区地方史《康藏史》编纂与研究”;2011年有两项,分别是霍巍任首席专家的“文物考古所见西藏与中原关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和吴佩林任首席专家的“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2013年亦有2项,分别是白彬任首席专家的“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调查与综合研究”和姜生任首席专家的“宋元明清道教与科学技术研究”;2015年有李映福任首席专家的“西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冶金遗址调查与研究”;2016年有2项,分别是陈廷湘任首席专家的“清代巴县衙门档案整理与研究”和何一民任首席专家的“20世

纪中叶以来西藏城市人居环境发展变迁研究”;2017年有李锦任首席专家的“20世纪20—40年代人类学‘华西学派’的学术体系研究”;2018年有2项,分别是霍巍任首席专家的“四川新出土南朝造像的整理与综合研究”以及原祖杰任首席专家的“19世纪美国工业化转型中的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研究”。其中超过半数于2013年后立项,从侧面反映出新时代四川省史学高速发展的事实。

三、学术成果举要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四川省历史学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建设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骄人的成绩。鉴于考古学与中国史、世界史研究在成果类型与阶段特征上的差异较大,以下分而述之。

(一) 历史篇

四川省的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历史文献与历史地理等多个门类均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其中上百本重要论著是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下面分三大阶段对这些学术成果做简要的介绍。

1. 转型与开创阶段(1949—1976)

本阶段是晚清、民国的“新史学”向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唯物史观转型的重要时期。徐中舒、蒙文通、缪钺、冯汉骥等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汇集省内,为四川省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囿于出版的困难,这一时期的重要学术成果多以论文为主,仅有少量学者拥有出版著作的机会,如徐中舒《左传选》、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缪钺《读史存稿》及《杜甫》、李思纯《江村十论》、王兴运《伯罗奔尼撒战争》、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等著作便是其中的代表。

2. 快速发展阶段(1977—2012)

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到来,老中青三代学人同时发力,将储存多年的学术积累尽数释放,大量高水平的著作不断涌现。先秦、秦汉史方面,巴蜀古史研究是重要领域,成果丰厚。以徐中舒《论巴蜀文化》与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为先导,出版了胡昭曦《巴蜀历史文化论集》、董其祥《巴史新考》、管维良《巴族史》、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及《巴蜀史稿》、屈小强《三星伴明月——古蜀文明探

源》、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谭继和《巴蜀文化辨思集》等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对古文献的笺注与考证是这一时期先秦、秦汉史研究的另一侧重点,徐仁甫《左传疏证》、缪文远《战国策考辨》及《战国策新校注》、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魏启鹏《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及《简帛文献〈五行〉笺证》是其中的代表作。古文字研究也是四川省史学的优势领域,积累颇丰。方述鑫《殷墟卜辞断代研究》、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及《春秋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何靖《中国文字起源研究》都是有极高学术水准与影响力的作品。此外还有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及《先秦史十讲》(徐亮工编)、黄少荃《黄少荃史论存稿》(袁庭栋辑)、黄奇逸《历史的荒原——古文化的哲学结构》及《商周研究之批判》、罗开玉《中国科学神话宗教的协合——以李冰为中心》、罗世烈《秦汉》、彭邦本《理性之光——荀子的智慧》、姚政《先秦文化研究》、高维刚主编《秦汉市场研究》等优秀作品问世。

魏晋南北朝史方面,世家大族研究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领域。以蒙思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方北辰《魏晋南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为此时期代表。政治制度领域,有陈玉屏的《魏晋南北朝兵户制度研究》与杨民的《秦汉西晋中央与巴蜀地方关系研究》。人物研究有杨耀坤与刘重来《陈寿与〈三国志〉》、杨耀坤与伍野春《陈寿 裴松之评传》、孔毅《魏晋名士》等。景蜀慧的《魏晋诗人与政治》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研究魏晋人物,还借鉴了西方文学、心理学理论,在方法论上有启示意义。文献整理考证上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积数十年之功,对常璩所撰《华阳国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与考证,驳斥了前人诸多谬说,提出了大量新颖独到的见解。此外较有特点的作品还有李祖桓《仇池国志》、景蜀慧《中国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龙显昭《三国文化历史走向》、陈玉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等。

隋唐史研究方面,缪钺的《杜牧传》与《杜牧年谱》是较早的重要著作。此外,政治史研究是这一时期的重心所在,王炎平《牛李党争》及《科举与士林风气》、何汝泉《唐代转运使初探》、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及《天宝十四载——盛世终结

与李杨情变》等著作为其代表。另有谭英华《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卢华语《唐代蚕桑丝绸研究》、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等优秀作品问世。

宋元史研究方面,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修订版)与吴天墀《西夏史稿》是具有开创之功的重量级作品。主要的研究成果则集中在政治史与学术史领域,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刁忠民《两宋御史中丞考》及《宋代台谏制度研究》、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张邦炜《宋代皇帝与政治》、李勇先《宋代添差官制度研究》、胡昭曦与刘复生及粟品孝合著《宋代蜀学研究》、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粟品孝《朱熹与宋代蜀学》、杨世文《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郭齐《朱子学新探》、李文泽《宋元语文学著述考录》等。军事战争则是宋元史研究的另一侧重点,粟品孝《南宋军事史》、王晓波《宋辽战争论考》、陈世松《蒙古定蜀史稿》、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编《钓鱼城史实考察》是其中的代表作。人物研究有王晓波《寇准年谱》与季平《司马光新论》。社会史研究有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蔡东洲《宋代阆州陈氏研究》、方燕《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立足于女性生育、疾病的考察》。此外的优秀作品还有吴天墀《吴天墀文史存稿》、李国玲《宋僧著述考》等。

明清史研究方面,成果虽然不多,涉及面也较小,但仍不乏重要著作。有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辩——兼析“湖广填四川”》、袁庭栋《张献忠传论》、陈世松《大变迁:“湖广填四川”影响解读》、谢放《中体西用之梦——张之洞传》、沈传经《左宗棠传论》、黄祖文《中缅边境之役(1766—1769)》、张学君与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彭久松与陈然主编《四川井盐史论丛》等。

近现代史方面,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较为传统的政治史、革命史与中共党史领域。较为重要的著作有隗瀛涛参与编著的《辛亥革命史》、隗瀛涛编著《四川保路运动史》、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史式《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及《太平天国史实考》、李有明《李永和蓝朝鼎起义》、王庭科主编《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历史发展》、唐志宏与谭继和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史稿》、周锡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林超与温贤美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史》、张弓与牟之先《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实》、李世平《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曾瑞炎《华侨与抗日战争》、康大寿与陈国勇《近代中国的对外赔款》、匡珊吉《四川军阀史》、马宣伟与肖波《四川军阀杨森》等。此外学术史、社会史领域还有李润苍《论章太炎》、陈德述《廖平学术思想研究》、李耀仙《廖平与近代经学》、赵清《袍哥与土匪》、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等代表性著作问世。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近现代史领域一大批中生代学者开始大展拳脚,重要成果呈爆发式增长,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远迈前人,近现代史研究的面貌为之一新。从1995年起的十数年间,罗志田有包括《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家”的思想论争》《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在内的十余本专著出版,研究范围涉及晚清民国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中外关系史等多个领域,研究风格独树一帜,开一时之风气,在全国近现代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四川省近现代史研究多点开花,硕果累累。中外关系史方向,杨天宏关于基督教的系列著作《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梳理了近代以来基督教在华发展状况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成果斐然。秦和平《基督宗教在四川传播史稿》、鲜于浩与田永秀《近代中法关系史稿》等都是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著作。政治史方向,代表性成果有杨天宏《中国的近代转型与制约》及《政党建制与民国政制走向》、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1840—1940)》、苟德仪《川东道台与地方政治》等。学术史、思想史、教育史方向,代表性成果有杨天宏《新民之梦 梁启超传》、蒙默《蒙文通学记》、徐亮工编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王川《李源澄先生年谱长编》、王承军《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彭华《马

寅初的最后33年》、周鼎《刘咸炘学术思想研究》、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陈廷湘与周鼎《天下·世界·国家——近代中国对外观念演变史论》、侯德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等。社会史、经济史方向,代表性成果有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李德英《国家法令与民间习惯: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租佃制度新探》、里赞《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践》、杨兴梅《身体之争:近代中国反缠足的历程》、廖胜《妇女与太平天国社会》等。在较为传统的革命史、中共党史领域,仍有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如李殿元《新发现孙中山文稿及其研究》、吴达德《吴玉章与中国民主革命》、王庭科《走自己的路——中共党史论集》、李健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徐学初《中华苏维埃经济建设研究》、王安平与杨绍安《朱德思想研究》等。此外,西华师范大学、南充市档案局编《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以及蔡东洲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写作的《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学术成果。

世界史研究方面,1989年集结赵卫邦生前论文成书的《赵卫邦文存》是较早的作品。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顾学稼与陈必录等编著《美国史纲要》、张箭《地理发现研究(15—17世纪)》、徐波《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民族史学研究》、王挺之与刘耀春及刘君合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城市与社会生活卷》、王蕾《旧金山媾和与中国(1945—1952)》、陈紫华等《梦想与辉煌——西方现代化探索之一》、罗建国《非洲民族资本的发展(1960—1990)》、邹一清《生存还是死亡——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古蜀文明存亡启示录》、孙培良《萨珊朝伊朗》、许晓光《天方神韵——伊斯兰古典文明》、杨洪贵《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研究》、何平英文著作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ity—Cultural Discourse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中国的现代性追寻——20世纪末的文化话语》)等。

专门史研究是四川省史学最具代表性的门类。1980年刘德仁、沈庆生、王家楼的《四川古代科技人物》是该门类最早的著作,类似的还有毕剑横《中国科学技术史概述》、冯汉鏞主编《巴蜀科技史研究》。

1983年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则反映了教育史研究方面的高水平,近似的还有马廷中《民国时期云南民族教育史研究》。1989年周勇《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是城市史的开拓之作,较为重要的城市史研究还有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王瑞成《中国近代工商业城市类型研究》等。1990年陈定阔《中国社会思想史》提示着思想史渐渐成为学界集中讨论的热点,思想史的著作还有王德裕《先秦哲学史论》。1991年李禹阶《权力塔尖上的奴仆——宦官》关注了政治史中独特的现象,而李禹阶与秦学硕的《外戚与皇权》是其进一步的研究。1991年余也非《中国古代经济史》开启了经济史领域的研究,经济史的著作还有刘静夫《中国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邓绍辉《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侯德础《中国工合运动研究》、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等。此外,李世平《四川人口史》、谭红主编《巴蜀移民史》、王绿萍《四川近代新闻史》、陈力《中国图书史》、程大力《中国武术——历史与文化》、郝勤《体育史》都拓展了四川省历史学的研究视野。

民族、民俗史是专门史中的大宗。蒙文通《越史丛考》、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冉光荣与李绍明及周锡银合著《羌族史》、李绍明《民族史》、蒙默《南方民族史论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凉山彝族奴隶社会》都是早期分量颇重的民族史著作。藏学研究一直是四川省民族史领域的重心之一,较为重要的成果有冉光荣《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及《中国藏传佛教史》、刘传英《巴塘藏族反教卫国斗争史略》、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及《青藏高原碉楼研究》、徐君《狼牙刺地上的村落》、赵心愚《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袁晓文与李锦主编《藏彝走廊东部边缘族群互动与发展》、王川《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及《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等。此外涉及到西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性成果还有李绍明《巴蜀民族史论集》及《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刘复生《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中心的考察》及《夔国与泸夷》、伍湛《伍湛民族学术论集》、李星星《曲折的回归:四川西水土家文化考察札记》、杨铭《氏族史》、郎维伟《四川苗族社会与文化》等。史料方面有蒙默《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与四川省民族研

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邓子琴《中国风俗史》是民俗史研究的先驱。此后,孙晓芬《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罗开玉《丧葬与中国文化》、黎小龙《民族心态与居室文化》、罗新本与许蓉生《中国古代赌博风俗》、许蓉生《水与成都——成都城市水文化》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

历史文献学与历史地理学方面,1985年出版的赵吕甫《云南志校释》是历史文献学的早期代表,同一范畴的还有方北辰《三国志全本今译注》、杨耀坤《三国志今注本》、李纯蛟《三国志研究》、金生杨《〈苏氏易传〉研究》、文廷海《清代春秋穀梁学研究》、舒大刚《儒学文献通论》等。历史地理学方面则以1989年蓝勇的《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开其端绪,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李勇先《〈舆地纪胜〉研究》、郭声波整理《大元混一方輿胜览》、黎小龙等《交通贸易与西南开发》、邓廷良《西南丝绸之路考察札记》、阮明道主编《西域地理图说注》、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张莉红《在闭塞中崛起——两千年来西南对外开放与经济、社会变迁蠡测》等著作则是这一时期历史地理学方面的标志性成果。

此外,地方通史也是史学工作者一直努力的方向,1986年陈世松主编《四川简史》问世,标志着四川地方通史写作的开始。1988年,蒙默、刘琳、胡昭曦、柯建中合著《四川古代史稿》。1994年贾大泉、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该书在2010年出版重修本,共7卷,计500万字、1000余幅图,在原版良好的基础,质量有明显提高,内容上务实求信、创新求深,是目前为止最好的一套四川通史著作。2011年《成都通史》编纂委员会编《成都通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成都建城2300年以来的第一部通史,共7卷,计335.7万字,各卷分“概述”“专题”“大事记”三部分,其内容涵盖成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演变的历史进程,着重勾画城市文明为核心的发展轨迹。

这一时期的重大成果还有重要辞书类的编纂。徐中舒1984年主编《殷周金文集录》;1986年主编《汉语大字典》;1988年主编《甲骨文字典》。1993年彭裕商、常正光、方述鑫编纂《甲骨金文字典》等。大型历史文献编纂:2006年,曾枣庄、刘琳主编《全

宋文》。重要学科人物的文集或全集:1998年,徐中舒选编《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2001年蒙默编《蒙文通文集》;2004年缪元朗、景蜀慧编校整理《缪钺全集》等。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后,四川省历史学研究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阶段,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学术成果的数量与质量较上一阶段均有显著的提升;第二,除先秦史、民族史等研究领域保持优势地位外,宋史、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等研究经过多年的积累,发展迅猛,涌现出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学者与著作;第三,研究的范围与视野不断拓展,从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方向,逐步延伸到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等方向。

3. 持续发展阶段(2013年至今)

进入新时代之后,老中青史学工作者倍受鼓舞,再接再厉连续在各个领域推出更高水平的新作品。

先秦、秦汉史研究方面,徐中舒《古器物中的古代文化制度》(徐亮工编)、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段渝《西南酋邦社会与中国早期文明》、龙显昭《龙显昭学术论文集》、李世佳《春秋楚国霸权问题研究》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

隋唐史研究方面有黄日初《唐代文宗武宗两朝中枢政局探研》。宋元史研究方面,代表性作品有韦兵《完整的天下经验——宋辽夏金元之间的互动》、黄博《谣言、风俗与学术:宋代巴蜀地区的政治文化考察》、王红梅《元代畏兀儿历史文化与文献研究》、董春林《政治文化重建视阈下的南宋初期诏狱研究》、张邦炜《恍惚斋两宋史随笔》等。

明清史研究方面,代表性作品有张循《道术将为天下裂——清中叶“汉宋之争”的一个思想史研究》、张箭《郑和下西洋研究论稿》、谯珊《重庆:旧秩序中的精英与城市管理1644—1911》、邹立波《明清时期嘉绒藏族土司关系研究》、黄豪《明代佛教劝善运动》等。

与古代史研究学术成果少而精的特点不同,近现代史研究延续了前20年质量与数量并进的强劲势头。学术史、思想史、史学史领域,罗志田《经典淡出之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及《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仍是具有极高学术水准的作品,同时期的代表性成果还有王东杰《近代

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及《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刘复生与徐亮工及王东杰合著《近代蜀学的兴起与演变》、缪元朗《缪钺先生编年事辑》及《缪钺先生学记》、魏红翎《成都尊经书院史》、刘开军《晚清史学批评研究》等。社会史与地方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揭示出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眼光下移”的新趋势,王东杰《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李德英《近代长江上游农民生活状况研究——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考察》、成功伟《合作组织与乡村社会: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运动研究》、吴佩林《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皆为转型期的佳作。此外,以黄天华《边疆政制建置与国家整合:以西康建省为考察中心(1906—1949)》与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1931—1948)》为代表的边疆史研究也开始崭露头角。在新的学术增长点不断涌现的同时,传统的政治史领域仍不乏重量级成果,尤以杨天宏《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及《法政纠结:北洋政府时期“罗文干案”的告诉与审断》、陈廷湘《晚清民国政府应对民众运动史论》等著作最具影响。抗战史领域,代表性成果有刘世龙《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战时动员与农村》、李瑞与吕毅《抗日老兵亲历记》、张彦《四川抗战史》等。

进入新时代后,世界史研究焕发出勃勃生机,尤以欧洲史成果最为丰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孙锦泉《文艺复兴与中西文化交流》、徐波《文艺复兴时代著名历史学家及其代表作》及《西方史学思想史》、吕和应《有限性的悲剧:狄尔泰的生命释义学》、王磊《19世纪英国刑法改革研究》、刘君《威尼斯与阿姆斯特丹——十七世纪城市精英研究》及《从手艺人到神圣天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阶层的兴起》、辛旭《英国激进主义与法国大革命(1789—1815)》、李伯槐《铁腕柔情——撒切尔夫人传》、付有强《英国人的“大旅行”研究》等。孙锦泉、邹薇合著《东方文化西传及其对近代欧洲的影响》一书被翻译成英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在海外各国发行,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专门史方面,以城市史、民族史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城市史领域,以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为依托,其学术团队众志成城,短短6年间推出了《革新与再

造: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发展与转型》《世界屋脊上的城市——西藏城市与社会变迁研究(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西部农牧地区城市历史变迁研究》《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变迁》《动力·结构·空间——多元视阈下中国城市历史发展研究》等一系列优秀著作。专门史方面其他的重要著作还有陈力《中国古代图书史》、王雪梅《近代中国的商事制定法与习惯法》、罗凯《2500年战争与和平的交响——扬州瘦西湖文化景观的历史断代研究》、潘家德《近代四川民俗变化研究》、柯建中《灯下集》、张循《四川方志史》、王义全与邹洪伟《四川史专题考》、何一民与付志刚《成都简史》等。

民族史领域仍以藏学研究最为耀眼。较为重要的成果有石硕与李锦及邹立波合著《交融与互动:藏彝走廊的民族、历史与文化》、袁晓文与李锦《藏彝走廊多彩的格萨尔》及《交流互动发展——全球视野中的西南各少数民族》、李锦《家屋与嘉绒藏族社会结构》、玉珠措姆的英文著作《瞻对的“独眼龙”勇士:工布朗吉在康区的兴起》(美国列克星敦出版社)。史料整理方面的成果有任乃强、任新建编著《清代川边康藏史料辑注》。

此外,口述史的萌芽与兴起反映出四川史学在新时代的多元发展趋势。以李德英《尘封的记忆:中和场口述历史》及其与张杨的《多元视角下口述历史方法的探索与实践》等著作为先导,中和场口述历史调查、成都钢铁厂口述历史调查、共和国三线建设口述历史调查、川大百岁老人口述历史调查等众多实践活动为四川省历史学界培养了大批口述史人才。

进入新时代后,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大型历史文献的编纂更为活跃。刘琳与刁忠民及舒大刚等主编《宋会要辑稿》(全16册)、周斌与孙锦泉等主编《日本汉文史籍丛刊》、李勇先主编《中国西南地理史料丛刊》与《巴蜀珍稀文献汇刊》等都是标志性的学术成果。

2013年至今时间虽然不长,但史学工作者抱着建设具有时代高度的中国历史学的决心,不断耕耘,四川省的历史学发展出现了以下显著的变化:第一,新生代的历史学者开始崭露头角,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为四川省史学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

近现代史研究势头依然强劲,但研究者的“学术眼光”明显“下移”,从关注全国性的重大问题转向关注更加地方性的、具体的、具有地域性特征的问题,许多“新材料”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地方史与社会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是这一转变的表征;第三,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尤以口述史与边疆史的兴起为代表;第四,跨学科、跨领域的多学科交叉成为研究的新趋势,大量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被引入史学研究中。

(二) 考古篇

四川的文物考古工作与国家和四川省的发展密切相关,经过70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是四川文物考古事业不断进步的体现。下面分三大阶段对四川考古学在70年发展中取得的学术成果进行简要梳理。

1. 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6)

本阶段是四川文物考古事业初步发展的阶段,在学术成果的数量、类型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许多成果具有开创性意义,奠定了四川文物考古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整体而言,本阶段四川地区文物考古工作的学术成果以资料性成果为主,研究性成果为辅。其中资料性成果主要有裴文中与吴汝康编《资阳人》、闻宥集撰《四川汉代画像选集》、刘志远与刘廷壁编《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冯定国与周乐钦及胡伯祥编《四川邛崃唐代龙兴寺石刻》、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沈仲常与冯定国及周乐钦编《四川汉代陶俑》、冯汉骥撰《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等。其中《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对新中国成立前发掘的五代前蜀王建墓进行了系统的报告,王建墓是我国20世纪首次科学发掘的古代皇陵,在中国陵寝考古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该书自出版以后便被学界公认为历史时期考古报告及研究的典范。除此之外,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文管会)、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和成都市文物管理处等文物考古机构还在《考古学报》《考古》《文物》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考古简报,基本涵盖了四川各主要区域上自旧石器时代,下至明代的各种考古材料,涉及墓葬、遗址、石刻、摩崖造像、古人类化石、出土文物等。

本阶段研究性的学术成果主要是对考古发现进

行的相关研究,其中代表性成果如冯汉骥的《王建墓内出土“大带”考》《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徐中舒的《巴蜀文化初论》《巴蜀文化续论》《四川彭县濠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觶》,童恩正的《略谈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榔铜棺墓的族属》《从四川两件铜戈上的铭文看秦灭巴蜀后统一文字的进步措施》,秦学圣《关于资阳人的年龄和性别问题》,于豪亮《四川涪陵的秦始皇二十六年铜戈》,王家祐《四川广元黑釉窑初探》等。上述这些成果多具有开创性,如徐中舒、冯汉骥等对巴蜀文化、云南青铜文化等的一系列研究开启了西南考古的新篇章。

2. 快速发展阶段(1977—2012)

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到来,四川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产生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大致可分为资料性论著、研究性论著、教材等类型。根据学科发展的阶段性,本阶段还可以200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出版的资料性成果包括考古报告(简报)、资料性图录及文物志等类型,涉及墓葬、遗址、石窟寺、古建、文物藏品等方面的内容,时间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元明。其中考古报告(简报)类的代表性成果如《巫山猿人遗址》《四川考古报告集》《三星堆祭祀坑》《宝墩遗址:新津宝墩遗址发掘和研究》《四川广元市中子铺细石器遗存》《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成都市上汪家拐街遗址发掘报告》《四川涪陵小田溪四座战国墓》《四川炉霍卡莎湖石棺墓》《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第二次发掘简报》《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成都凤凰山西汉木榔墓》《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四川西昌东坪汉代冶铸遗址的发掘》《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四川万县唐墓》《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四川重庆明玉珍墓》等。除上述四川本区域的成果外,本期由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在西藏开展了考古工作,形成了一系列西藏考古的资料性成果,如《昌都卡若》《西藏考古(第一辑)》《吉隆县文物志》《阿里地区文物志》《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等,其中《昌都卡若》一书由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和四川大学教研室共同编写,童恩正先生主笔,是西藏第一本专业考古报告。资料性图录成果涵盖的内容比较多样,其中石窟造像类有《安岳石刻》《大足石窟》《中国美术全集·四川石窟雕塑》《中国石窟雕塑精华·四川重庆卷》等;古建筑类有《四川古建筑》《四川汉代石阙》等;墓葬艺术类有《四川汉代画像砖》《四川汉代画像石》《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等;文物藏品类有《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四川省博物馆》《中国青铜器全集·巴蜀卷》《巴蜀青铜器》等;文物志书类成果主要是《四川省志·文物志》(上、下)。

本期出版的研究性论著类型多样,涉及巴蜀考古、西南考古、宗教考古、西藏考古及历史时期考古等方面的内容。随着四川地区先秦考古材料的逐渐丰富,特别是三星堆祭祀坑等的发现,巴蜀考古进入了一个高潮,产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如徐中舒主编《巴蜀考古论文集》、林向《巴蜀文化新论》、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李绍明与林向及徐南洲主编《巴蜀的历史·民族·考古·文化》、李绍明与林向及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等。西南考古在本期也形成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如童恩正的《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及《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张勋燎《四川凉山昭觉石板墓的族属和古代的乌浒人》、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刘弘《川西南大石墓与邛都七部》等。四川拥有丰富的佛教和道教考古资料,为宗教考古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条件,本期在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刘长久与胡文和及李永翘编著的《大足石刻研究》、刘长久《中国西南石窟艺术》、王家祐《道教论稿》及《四川道教摩崖造像概况》、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等。本期还有一些历史阶段的专题类考古研究成果,如宋治民《汉代手工业》、霍巍与黄伟《四川丧葬文化》、袁庭栋《成都城坊古迹考》、陈丽琼《四川古代陶瓷》及《四川古陶瓷研究》等。随着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在西藏开展考古工作,亦在该领域形成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如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等。为促进考古专业人才的培养,本期四川大学考古专业还出版了一批教材,如童恩正《文

化人类学》、宋治民《战国秦汉考古》、马继贤《博物馆学通论》、康忠镛主编《文物保护学基础》等。此外,本期还出版了一批综合性的论文集,如《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于豪亮学术文存》《四川考古论文集》《四川考古研究论文集》《华西考古研究》《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等。

2000年以后四川的文物考古事业较之前又有发展,学术成果进一步丰富。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增多以及考古资料整理工作的推进,本期四川省发表了大量的资料性论著,涉及不同的区域和主题。其中关于四川地区墓葬和遗址类的代表性成果有《成都十二桥》《成都商业街船棺葬》《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安宁河流域大石墓》《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安宁河流域古文化调查与研究》《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绵阳双包山汉墓》《三台郪江崖墓》《中江塔梁子崖墓》《华莹安丙墓》《泸县宋墓》《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射洪泰安作坊遗址》等。摩崖石刻类成果有《巴中石窟》《巴蜀佛教碑文集成》《广元石窟》《巴中石窟内容总录》《四川安岳卧佛院唐代刻经窟》《绵阳龛窟》《夹江千佛岩》等。此外,本期在《四川文物》《成都考古发现》等刊物中也发表了大量四川地区的考古新资料。古建方面的成果有《四川文庙》《平武报恩寺》《四川古建筑测绘图集》等。文物专题类成果有《四川博物院文物精品集》《成都馆藏文物精品选著》《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集萃》《从三星堆到金沙:来自古蜀王国的珍藏》《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全三册)》《中国画像石棺全集》等。本期四川省还出版了若干文物志书、文物地图集和文物普查等方面的成果,如《成都市志·文物志》《四川省志·文物志(1986—2005)》《四川文物志》《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等。本期四川省文物考古学者还刊发了不少与省外有关的考古成果,如《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中国文物地图集·西藏分册》《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和《耿马石佛洞》等著作。

本期有关四川省考古的研究性论著数量众多,涉及主题和区域多样。其中巴蜀考古研究的代表性论著有宋治民《蜀文化》、林向《巴蜀考古论集》、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霍巍与王挺之主编《长

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赵殿增与李明斌《长江上游的巴蜀文明》、江章华与李明斌《古国寻踪——三星堆文化的兴起及其影响》、赵殿增《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于孟洲《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江章华与王毅及张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江章华《金沙遗址的初步分析》等。西南考古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及《文化与生态、社会、族群:川滇青藏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霍巍与赵德云《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霍巍《西南考古与中华文明》、陈苇《先秦时期的青藏高原东麓》等。宗教考古的研究成果有张勋燎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王家祐《道教之源》、雷玉华《巴中石窟研究》等。其中《中国道教考古》是海内外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道教考古的著作,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的空白。科技考古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王毅、颜劲松《人种学及古DNA分析在成都金沙遗址及相关诸遗存研究中的应用》、金普军、赵树中、吕春林、杨伟《四川绵阳出土的西汉饱水漆木器的前期保护工作》、赵志军、陈剑《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黄翡、郭富、金普军《麦坪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水稻植硅体的发现及其意义》等。本期四川学术界还陆续出版了一批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论文集或纪念性文集,如《川大史学·冯汉骥卷》《宋治民考古文集》《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和徐鹏章《四川历史考古文集》等。此外本期还有一些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如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李映福《三峡地区早期市镇的考古学研究》等。最后,本期四川省考古学者在西藏考古领域也有一系列的研究论著问世,如霍巍与李永宪合著的《西藏西部佛教艺术》及《西藏考古与艺术》、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等。其中《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是近年来有关西藏考古综合研究的集大成者,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川考古学在本阶段获得了快速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学术成果的数量较上一阶段有显著增长;第二,成果涉及的地域进一步扩大,除四川本区外,本阶段四川考古学者在西藏考古领域有诸多成果呈现;第三,学术成果显示的研究主题进一步多样化,道教考古、科技考古及文物志书等方

面的成果在本阶段明显增多;第四,随着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出现,某些主题的研究不断深入,特别是巴蜀考古已经进入了兴盛期。

3. 全新发现阶段(2013年至今)

新时代的四川文物考古事业再度迈向了新阶段,出现了大量的学术成果。首先在资料性论著方面,本阶段继续出版了不少考古报告(简报),其中墓葬和遗址类的成果有《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金沙遗址考古发掘资料集》《茂县营盘山石棺葬墓地》《会理龚箕湾水坪梁子墓地》《宣汉罗家坝》《荣经高山庙西汉墓》《广汉二龙岗》《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乐山西坝窑址》《水井街酒坊遗址发掘报告》等。摩崖石刻类成果有《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四川大邑县药师岩石窟寺和摩崖造像考古报告》《安岳卧佛院考古调查与研究》《广元千佛崖》《仁寿牛角寨石窟》《四川散见唐宋佛道龕窟总录》等。文物藏品类成果有《四川博物院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选编》《中国巴蜀新发现汉代画像砖》《泸州市博物馆藏宋墓石刻精品》《江口沉宝》《四川平武土司遗珍——明代王玺家族墓出土文物选粹》等。本阶段四川省考古学者继续发表了一些来自省外的考古资料,如《卫辉大司马墓地》《丹江口潘家岭墓地》《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等。其中《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中国考古机构与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合作在越南开展考古工作的成果,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全球化的伊始之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阶段也有不少研究性论著问世,其中巴蜀考古研究的代表性论著有《宣汉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研究》、江章华《成都平原先秦聚落变迁分析》、林向《四川盆地的文明化进程新探》、施劲松《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墓葬、文化与社会》等。西南考古研究是四川考古学界的传统研究领域,本期发表的相关成果有周志清《滇东黔西青铜时代的居民》、段渝等《西南酋邦社会与中国早期文明》、《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等。宗教考古研究仍以佛教为主,相关成果有胡文和、胡文成《巴蜀佛教雕刻艺术史》、雷玉华、罗春晓、王剑平《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曾繁森《四川佛

寺壁画艺术》,蒋晓春、符永利、罗洪彬、雷玉华《嘉陵江流域石窟寺调查及研究》等。科技考古研究的成果在本阶段继续增多,有陈显丹与谢振斌《四川崖墓石刻病害调查与风化机理研究》、四川省文物局等单位编著《安岳石窟圆觉洞保护研究》、黄鑫等《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竹简饱水保存期间的细菌群落结构》、何锟宇《试论十二桥文化的生业方式——以动物考古学研究为中心》等。古建筑类研究成果有《四川古代牌坊》等;手工业考古研究成果有《四川地方窑研究论文选》等。本阶段四川省还出版有个人和会议论文集,如张勋燎《中国历史考古学论文集》、冯汉骥《川大史学·冯汉骥英文卷》、于豪亮《于豪亮学术论集》、王震中与高大伦及肖先进编《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四川省考古学者在本阶段也发表了不少与省外考古有关的研究论著,以西藏考古为主,代表性成果有《中国藏地考古》,霍巍、王煜、吕红亮合著《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第一卷:史前时代》,吕红亮《跨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西藏西部史前考古研究》,霍巍《青藏高原考古研究》等,此外还有不少成果发表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期刊上。

新时代以来的四川考古发展迅速,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成果的发表频率较以前明显加快;第二,学术成果的国际化学程度明显加强,不仅有不少学者在国外相关期刊发表相关研究论文,而且还有四川省学者在境外发掘的考古报告出版;第三,成果涉及的研究领域进一步多样化,这在科技考古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结语

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四川省历史学

(含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波澜壮阔,学科建设成绩瞩目,学术成果层出不穷。本文的爬梳只是大致勾勒出了一条线索,难免挂一漏万,完整的总结和严肃的学术史研究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完成的。希望本文能略具抛砖引玉之功。

注释:

- ① 如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哲学社会科学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成都市社科院编《成都市志·哲学社会科学志》,成都:巴蜀书社,200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考古60年》,《四川文物》2009年第6期。

参考文献:

- [1]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Z].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 《成都通史》编纂委员会. 成都通史[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
- [3]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 中国青铜器全集·巴蜀卷[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考古论文集[C].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 [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古建筑测绘图集[Z].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 [6] 四川省文物管理局. 四川省文物志[M]. 成都:巴蜀书社,2005.
- [7] 四川博物院. 四川博物院文物精品集[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8]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四川省志·文物志(上、下)[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 [9]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成都市志·文物志[M].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燕朝西]